

他山之石：宇文所安如何译释中国古代文论——以《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为例

□高 超 [山西师范大学 临汾 041004]

[摘 要] 宇文所安译释中国古代文论,从文本本身出发,采用直译的笔法,比较客观地再现了原文的风貌,而辅以解说与注释则弥补了翻译所缺失的文本中的那份准确与深刻,同时,宇文所安把文本与文本产生的历史以及文本诠释的历史互相征引,相互比照,以合理的历史想像力去诠释文本,梳理并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在广阔的文化史背景下的历史性变迁。

[关键词] 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译释并举;文史互征;中西比较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12)03-0095-04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最勤,收获颇丰。自从1975年他的博士论文《韩愈和孟郊的诗歌》出版以来,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专著已达十余种。其中,《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一书较为集中地展示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理解。

一、“译释并举”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编译的《中国文论》,主要论及《尚书》、《论语》等早期经典中涉及文论的部分,中经《诗大序》、《文赋》、《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等核心文本,迄止于清代叶燮的《原诗》。

《中国文论》摘选了中国传统文学经典选本中相关文论的片段,采用翻译加解说的形式,以文本为载体,梳理并论述了传统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在广阔的文化史背景下的历史性变迁。这种通过对原典翻译与解说的方式来讲述文学思想的方法,我们权且称之为“译释并举”。这种方法在本书中的运用大致表现为两种模式:第一,首先呈现出一段原文,再是一段译文,然后是一段解说——对若干问题的讨论,最后是相关注释。比如,在第一章“早期文本”中,对《论语》、《孟子》、《尚书》、《左传》、《易经》和《庄子》中等选文的翻译与解说。在《中国文论》中,原典中的一句文言文被译成英语往往需要几句话才能表达清楚,而解说的文字大多是一篇

并不简短的文字。第二,首先概略性地介绍所选原典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原典的主要内容以及后世对该原典的认知与评价,然后依次是原文、译文、解说与相关注释。

宇文所安这种通过对文本进行翻译与解说的方法来讲解中国古代文论看似简单,实际上极富创造性。首先,通过文本来讲述中国文论思想史的方法本身就是一种大胆的创新。乐黛云先生指出,“如果只用外来话语构成的模式来诠释和截取本土文化,那么,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独创性的文化现象,就有可能因不符合这套模式而被摈弃在外,结果,所谓世界文化对话也仍然只是一个调子的独白,而不能达到沟通和交往的目的。”^[1]这种通过对文本的翻译与解说来讲述中国古代文论思想的方法看似笨重、繁冗,却是建构在文本的基础之上,避免了西方理论的先入为主,避免了脱离古人的文本语境,为追求新的学术范式而产生的空疏之争——诸如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中西文论之争、史论之争等,还避免了直接从文本中抽取“观念”而又排除与所抽出的“观念”不完全吻合的大量相异文本的现象。

其次,中国古代文论文字深奥、语境复杂,任何试图单纯通过文本的翻译来呈现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做法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中国古代文论一旦译成英语,往往不知所云,非得有解释不可。钱

[收稿日期] 2011-10-26

[基金项目] 2008年度山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宇文所安汉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200822023)。

[作者简介] 高超(1969-)男,天津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钟书先生说过,“某一国的诗学对于外国人总是本禁书,除非他精通该国语言。翻译只像开水煮过杨梅,不够味道。”^{[2]530}确实,古汉语诗学的翻译更像开水煮过的杨梅,可能原味尽失,又怎么可能要求读者品出其中真味呢。宇文所安更是深有体会,他说“在中文里原本深刻和精确的观点,一经译成英文,就成了支离破碎的泛泛之谈。唯一的补救之策就是注释,如果不附加解说文字,那些译文简直不具备存在的理由”^{[3]14}。

宇文所安认为,“完全通过文本来讲述文学批评史就意味着尊重那些种类不一的文本”^{[3]12}。宇文所安运用“译释并举”的方法通过文本来讲述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既体现了他对文本的多样性、客观性的考虑,也体现了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尊重。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与认知,宇文所安在运用“译释并举”这种方法的过程中,又衍生出种种具体的办法尽量客观地再现文本所蕴涵的文学观念,诸如“直译”的笔法、对术语翻译与释义的灵活处理、比较的视野、追求文论表达方式的真正旨趣所在等。

二、“文史互征”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并非是一本以西方观念阐释中国文论的著作,而是把中国古代文论置于中国文化史的大背景下,以西方的视角去观察,以他者的眼光去审视,并在某些层面上(术语的内涵、命题的意义等)把它与西方的文论相比照,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彰显出中国古老文论的现代活力。

“文史互征”在此并非指的是文学与历史的相互征引,而是指文本与文本产生的历史以及文本诠释的历史互相征引,相互比照,以合理的历史想像力去诠释文本,并把文本置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以比较的视野突破中西文论体系各自为政的拘囿,揭示文本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文论》中,宇文所安对古代文论选本的解说采用了这种方法,具体而言,这种方法大致呈现以下几种特点。首先,从篇章结构上来看,《中国文论》以文本形成的时间为线索,重点选择中国文学思想从萌芽、形成、发展乃至成熟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通过翻译与解说文本内容的形式,比较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因此,以古代文论的经典文本为核心,历时性地考察古代文学理论,与潜在地梳理中国文学批评史相结合,这种结构本身就含有“文史互征”的因子。其次,除去第一章“早期文本”之外,其余十章都是在正式翻译解说文本内容之前,宇文所安以概说的形式,

揭示文本产生的特定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文本的特点以及文本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这些都与文本本身形成一个前后呼应的关系。因为在分析、解说文本具体内容时,宇文所安总是联系文本作者生活的时代,联系文本的读者接受史以及联系文本的诠释史而言说,在辨析了术语、阐释了古老的命题之后,其指向依然是该文本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宇文所安在解说古代文论思想时,特别注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注疏传统。他从《论语·为政》中“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所引发出对“知人”或“知世”的“知”的讨论,大发感慨,认为“中国传统诗学产生于中国人对这种解释学的关注,而西方文学解释学则产生于它的‘诗学’”^{[3]18}。进而,宇文所安把西方《诗学》的解释历史拿来与《诗大序》、《文赋》、《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的注疏传统相提并论,并认为,“像《诗学》一样,这些作品无法从它们的解释历史中孤立出来”^{[3]13}。宇文所安还认为,“中国文学话语传统中固然也有论文,但其权威性和魅力直到近年仍然比不上以具体文本的感发为基础的评点式批评。”^{[3]39}因此,宇文所安在讨论某一个术语、某一个命题时,他总乐于把历史上的注疏家与现代的注疏家一一请来参与讨论,对所给出的不同答案进行辨析,探究其“原本”的涵义。比如,在第四章“陆机《文赋》”中,对于句41、42一个对句“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的理解,在解说和后文的注释中,排列了李善、钱钟书、朱群生的笺注并进行对比,最后,宇文所安认为钱钟书的解释最好——“面对老虎显其本色,……龙一露面,成群的海鸟便惊飞而起”^{[3]111}。这样的例子在书中俯拾皆是,尤以第四章“陆机《文赋》”和第六章“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为最。据统计,在整个文论的翻译与解说中,宇文所安用作例证最多的古代注家是李善(著《文选注》),用作例证最多的现代注家当推钱钟书(著《谈艺录》、《管锥编》)。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宇文所安讲述文本所蕴涵的文学思想,总是把文本与文本诠释的历史互相征引,相互比照,再以合理的历史想像力去建构文本的“原意”,使之焕发生机和活力。

最后,除了把古代文论中的术语和命题放在中国文化史的大背景下作出纵向的历时性考察之外,宇文所安还极其善于把那些核心的术语和命题放在以中西文论比较的视野下进行横向的共时性考察。他在书中所列举的大量实例无一不具有跨文化的性质,下面我们略举一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例一,宇文所安在阐释“诗言志”这个中国诗学传统中开创性的命题时,先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了中西方对“诗”不同定义的内涵。“诗言志”这个定义和“a poem is something made(诗是某种制作)”都是重言式,但是“诗”不是“poem”,因为“诗”不是人们制作一张床或作一张画或做一只鞋子那种意义上的“制作”。西方的“Poem”可以制作,与中国的“诗”本质上“是”什么关系都没有。“Poem”和“诗”不是完全对等的翻译,这一差异直接“影响到中西传统怎样理解和讲授人与文本的关系”,因为“按照中国文论的说法,‘诗’的作者不能宣称他对自己的文本具有西方文论中的诗人对他的‘poem’那样的控制权”^{[3]27}。自然,宇文所安得出了类似这样的结论:对于西方诗学体系而言,“Poem”是其作者的“客体”,而对于中国古代诗学而言,“‘诗’不是作者的‘客体’,它就是作者,是内在之外在的显现”^{[3]26-27}。

例二,在第一章“早期文本”中,宇文所安节选了《庄子·天道》中一则故事——“反题”。故事讲述了善于斫轮之术的轮扁嘲弄桓公所读“圣人之言”乃“古人之糟粕”,因为语言不好使,它无法传达人内心最重要的东西,何况圣人已经死了呢?庄子通过轮扁之口表达了中国的文学传统中“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思想^[4]。宇文所安把庄子在文本中借轮扁之口对“圣人之言”的嘲弄与柏拉图对文学的攻击加以类比,因为柏拉图曾借苏格拉底之口攻击诗人说,“诗人写诗并不是凭智慧,而是凭一种天才或灵感;他们就像那种占卦或卜课的人似的,说了很多很好的东西,但并不懂得究竟是什么意思”^{[5]147},因此,宇文所安认为,“庄子的嘲弄驱动了中国的文学思想传统,正如柏拉图对文学的攻击驱动了西方的文学理论传统”,进而发现中西方两大文学传统中全部文学理论之作都像《庄子·天道》一样包含一种强烈的辩护性^{[3]36}。

钱钟书先生曾指出,“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2]530}美国比较文学家厄尔·迈纳也认为,“所论证的一切无非是比较诗学要求的两点:即令人满意的概念和实实在在的比较与对建立在翔实史料基础之上的诗学(文学概念)的重视。”^[6]显然,从上述宇文所安对中国古代文论一些重要术语、命题的翻译与阐释的案例来看,宇文所安对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翻译和解说不仅是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尝试,而且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一项重大研究成果。

三、结语

当代文学批评家童庆炳曾指出,“中西文论对话是有目的的,不是为了对话而对话。中西对话和对话式的比较,都不是牵强附会的生硬比附对应,我们的目的不是给中国古老的文论穿上一件样式的西装,也不是给西方的文论穿上中国的旗袍,而是为了中国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的建设。就是说,通过这种对话,达到古今贯通,中西汇流,让中国文论再次焕发出青春活力,实现现代转化,自然地加入到中国现代的文论体系中去。”^[7]宇文所安把中国古代文论的术语和命题置放在中国文化史的大背景下,实现了古今术语、命题注释的对照,同时,又把它们置放在中西文论比较的视野下,相互阐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已经突破了中西文论体系各自为政、自说自话的拘囿,形成了中西文论的对话。他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翻译与跨文化阐释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首先,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西播的途径,为中国古典文论走向世界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宇文所安对中国古代文学优秀典籍在美国的推广不遗余力;他编译《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也是基于建构美国文化的目的,他认为,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主要是为了美国的文化建设,而不完全是为了对中国文化发言^[8]。

其次,增进了中外学术、文化交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西方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研究的深入,中外学术交流会更加密切,在互识、互补中势必会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促进学术的繁荣,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东海西海,心里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9]。美国汉学家、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在《谈谈美国汉学的新方向》一文中指出,“近年来由于中西方深入交流的缘故,人们所谓的美国‘汉学’,已与大陆和台湾(或香港)的中国文学文化历史研究越走越近了。可以说,它们目前已属于同一学科的范围(field)。”^[10]再次,提供了一种新颖、独特的研究视角:注重把文学理论放在更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研究,形成一种更加开阔的视角,正如宇文所安所言,“对于今天的学者,一个有前景的方向似乎是站在该领域外面,把它跟某个具体地点和时刻的文学和文化史整合起来。”^{[3]“中译本序”}(2)最后,宇文所安译介、阐释中国古代文论所采用“译释并举”、“文史互征”、贯通古今、中西汇流的方法,十分有助于读者理解文学发生的历史,理解一个时时处于整合、变化中的中国文化传统,使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得以焕发青春的活力,以崭新

的面貌进入现代学人的视野,因此,我们还可以视之为对“中国古代文论向现代文论转换”的一大贡献。

注释

① 出自《易经·系辞传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参考文献

- [1] 乐黛云. 展望九十年代——以特色和独创进入世界文化对话[J]. 文艺争鸣, 1990, (3): 14-17.
- [2] 钱钟书. 谈中国诗[C]//钱钟书散文.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
- [3] 宇文所安. 中国文论: 英译与评论[M]. 王柏华, 陶

庆梅,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4] 祖行. 图解易经[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316.

[5]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古希腊罗马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147.

[6] 厄尔·迈纳. 比较诗学[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44.

[7] 重庆炳. 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J]. 文艺学新周刊, 2006, (8): 古代文论转化(1).

[8] 张宏生. 对传统加以再创造, 同时又不让它失真——访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斯蒂芬·欧文教授[J]. 文学遗产, 1998, (1): 111-119.

[9] 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

[10] 孙康宜. 谈谈美国汉学的新方向[J]. 书屋, 2007, (12): 35-36.

A Jade from Other Mountain: On Stephen Owen's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Taking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Criticism as Example

GAO Chao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4 China)

Abstract Stephen uses the method of literal translation in *Owe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which generates a more objectiv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riginal style, makes up the accuracy and profundity of the missing translation of the text supplemented by explanations and notes, and lastly quotes, proves and compares one another among the text, the history of the forming of the text and the history of the text interpretation in order to interpret the text with a reasonable imagination of history and comb and discuss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broad context of cultural history.

Key words Stephen Owe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simultaneously; quoting and proving each other between literary and history;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poetics and western poetics

编辑 刘波